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
创新工程国际理论前沿丛书·第一辑
主编：黄仁伟 张兆安

海外中国学 理论前沿

中国与世界

乔兆红◎编著

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
创新工程国际理论前沿丛书·第一辑
主编：黄仁伟 张兆安

海外中国学 理论前沿

中国与世界

乔兆红◎编著

INNOVATION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外中国学理论前沿：中国与世界 / 乔兆红编著. —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

ISBN 978-7-5520-2138-7

I. ①海… II. ①乔… III. ①中国学—研究

IV. ①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9034 号

海外中国学理论前沿——中国与世界

编 著：乔兆红

责任编辑：路征远

封面设计：周清华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颀辉印刷厂

开 本：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19.5

字 数：309 千字

版 次：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2138-7/K·415 定价：7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 创新工程国际理论前沿丛书概述(代序)

当前,社会科学领域正面临大量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理论界的证明和创新。上海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研究机构、党中央国务院的思想库和智囊团,近年来,围绕“国家战略和上海先行先试”高端智库建设目标,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两个一百年”战略构想、“十三五”规划、国家安全战略、全球治理等领域的若干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完成了一批中央决策需要的、具有战略和全局意义、现实针对性强的高质量成果。

在“创新工程”机制下,上海社会科学院结合研究生教学和高端智库建设方向,于2015年初正式启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学术前沿”编撰和出版项目,力图反映相关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和理论探索前沿,为硕士研究生理论积累和博士研究生阶段学习提供引导,也为授课教师提供基础性材料。此次组织出版的丛书,是201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和研究生院共同资助的第二批集中成果,重在梳理国际领域相关哲学社会科学近年的重要观点和成果。丛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四个全面”为根本指导思想,以习近平“5·17”讲话为原则,以我院60个创新团队为骨干力量编撰。

整个申报评审过程秉承了院“创新工程”公开竞争,择优选取、差额资助原则,所有立项申请均委托第三方组织评审,根据申报质量进行差额资助,确定通过名单向全院公示。为确保编撰质量,成立了院领导牵头、各研究所所长组织、创新团队首席专家领衔、院部相关处室协同“四位一体”的组织框架和工作机制,为丛书的顺利出版提供了保障。

丛书编委会

2017年4月15日

原 书 缺 页

第五章 国际视域下中国道路的政治优势与思想价值	144
第一节 “中国模式”的政治内涵	144
第二节 “政治西方”：西方“自由—民主”范式的局限	145
第三节 中国成功的政治密码及政治发展	148
第四节 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价值与国际意义	151
第六章 中国发展的海外视角	155
第一节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新提升	155
第二节 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166
第三节 中国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的现状和原因	171
第四节 中美关系的临界点已近在眼前	181
第七章 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国大陆研究：台湾地区研究者如何讲述中国大陆故事	188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方法	188
第二节 个别故事主题分群分析	192
第三节 综合主题分群结果讨论	197
第四节 台湾地区之中国大陆故事主题变迁	201
第八章 “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中国学视野下的经济解读	203
第一节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问题的探讨	203
第二节 市场配置资源与政府角色转变	208
第三节 自主创新体系与“互联网+”新优势	213
第四节 自贸区试验与人民币国际化	217
第九章 新常态背景下的政府与社会：中国学视野下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	227
第一节 中国社会结构的新变化	227
第二节 社会治理与社会组织	231
第三节 社会保障与社会公正以及社会质量的国际比较研究	237

第十章 “一带一路”与“利益共同体”：中国学视野下的国际区域	
合作发展之路	243
第一节 “丝绸之路”的历史与未来	243
第二节 “一带一路”的内涵与外延	246
第三节 基础设施网络与产业资金链	248
第四节 构建“一带一路”合作机制	250
第十一章 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以新的世界秩序为起点构建	
新型大国关系	260
第一节 战后秩序的维护与更新	260
第二节 亚洲秩序与全球治理	263
第三节 合作共赢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270
附录 海外中国经济研究新书纵览	281

原
书
缺
页

衰减,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争论各方之主要思想武器仍基本是西来的,清季以还的中西“学战”逐渐变为中西名义下实际的西与西战。

如同中国在世界学术界的“失语”一样,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失语”现象也十分明显。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作为责任大国走上了国际舞台,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是中国应对当前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一种诉求。21世纪,国际权力的转移给既是大国又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谋求国际权力提供了历史机遇,然而,仅仅关注于或满足于“文化软实力”诸项指标的提升是不够的,必须拥有充分的占领时代“文化制高点”的勇气,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目前,中国的综合实力已有较大提升,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并未同步增强。在国际社会现有逻辑和语境下,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无法回避国际权力问题。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也是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及其在国际事务中所承担的责任相适应。被视为“民族魂”的鲁迅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强调,中国人如果只是梦想强大或者自以为强大,会蕴含着极大的危险,但也不能苟同那种过分自卑的态度,宣称“20世纪的舞台上没有我们的份,是不合理的”。^①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海外高度关注,也带动了海外中国研究的进一步兴盛。以研究“中国文化,中国事物,中国现象,中国问题”为对象的海外中国学迅速发展,成为国际学术界中增长最快的“显学”。而中国国内对海外汉学和中国学的研究也方兴未艾。在201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和《教育部学习宣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重点工作》中,都明确把“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列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和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重要抓手和重点工作之一。

随着世界对中国关注度的不断提高,不同学科领域内的中国研究呈现爆炸式增长,在现行的西式学术分科框架内,已无法对其动因、内涵和走向进行总体把握。“世界中国学”具有明显的综合性优势,有助于打破文化、国界和学科的多重壁垒,沟通古今中外,抓住海外理解和阐释中国的核心议题、概念工具和话语逻辑。从海外中国研究发展轨迹来看,在以现当代中国为社会科学

^① 鲁迅:《准风月谈·黄祸》,《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09页。

分析对象、以地区战略需求为导向的美国中国研究崛起后，中国学（China Studies）和根植于欧洲东方学的传统汉学没有有效衔接，造成了当今西方世界中存在“两个中国”的现象，即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历史中国”与一个不合乎西方现代规律的、迅速崛起的“当代中国”，在割裂而互不联系的方向上展开。中国本土的中国学研究恰恰可以“他者”立场介入西方学术场域，打通“传统中国”与“当代中国”的研究区隔，从一个连续文明体的存续和更新的角度，重塑一个完整的“中国形象”。

长期以来，海外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属于专题研究，较多涉及事件、阶段和区域研究，缺乏总体性研究，而且，以往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历史过程的描述和对局部问题的阐释上，缺乏对历史运动本质的总体把握和理解，以致各种局部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互相矛盾、彼此冲突。现在我们倡导的“中国学”研究注重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立体分析，从而建立起拥有国际话语权的中国问题研究。未来的世界将是不同文明进一步交流、碰撞、相互学习、相互提升、共同发展的过程。同时，这个过程又将是一个竞争过程：道路的竞争、理论的竞争、制度的竞争，而这些竞争的根本是文化的竞争。以“中国学”学术研究牵引的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总结和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探究，是增强我国文化竞争力的必要工作。

当今世界，国际话语权的分配极不平衡，以欧美为主体的西方占据明显的主流和强势地位，美国甚至拥有话语霸权，而非西方世界处于弱势地位。^①当前，中国的崛起之路面临较为严峻的舆论挑战，“崩溃论”“威胁论”塑造的负面中国国家形象，反映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外交层面上的战略猜疑和国际公共舆论场中的话语权斗争。

近年来，中国关于国际话语权的意识不断高涨，但同时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的现实处境和权力运用上存在着多重困局。一是“西方中心论”导致中国的国际身份常常“被定义”，且中国长期以西方话语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尺，没有自己

^① 当今国际话语权“分配”极不平衡的状况，总体上反映了作为一种“软实力”的话语权与硬实力的权力分配状况的一致性。如果把国际话语权划分为反映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话语权与具体国际问题上的话语权这样两种类型，那么情况就会更加复杂一些。包括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市场经济等概念在内的西方话语，无疑是当今世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的主导性话语，但是具体国际问题上的话语权却会因具体情况而异。详见张志洲：《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困局与出路》，2009年8月18日人民网。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罗斯青年的汉语学习热情空前高涨。与此同时,俄罗斯中国学研究却遭遇了人才严重流失、老化和断代的危机,研究成果产出放缓,质量出现滑坡。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投入不足、学术人才管理制度不健全以及中国学知识的供需矛盾是导致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许多俄罗斯中国学家疾呼采取积极措施,保持俄罗斯的中国学大国地位。

关于韩国的中国研究现状。韩国的中国研究从传统汉学衍生而来,以区域研究的形态正式开始研究中国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因于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及之后的南北韩关系缓和。20世纪80年代末期正式形成的中国研究,是在西方对中国研究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政策研究,因为无法实地考察,而出现意识形态的限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及中韩关系正常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韩国的中国研究萌发新的转机。韩国韩信大学教授金都姬指出:“中国大陆惊人的经济成长和两国多方面的交流扩大与深化,引起韩国社会对中国的关注日增,中国研究在量的方面随之展现出高度成长。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全球化潮流,区域研究与相关学术团体涌现,同时,在教育方面新兴的与中国相关的科系和专门区域研究所设立了,所以这时期韩国的中国研究,已经形成学术养成与传承的制度基础了。”

随着20世纪90年代韩国中国研究的制度化,其中国研究在研究环境、研究人力、研究成果及质量方面,均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研究人数不断增加,而且韩国学者均认为“研究者的数量增加是中国研究增强的反映”。研究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比如研究经费等不断改善,研究成果不断增长,且经济类研究成果最多。在质量方面,一是发生了从以前教科书或概括说明式的研究著作转向对具体的主题展开周密论理的研究著作;二是在重要核心期刊的杂志上发表关于中国研究的论文数量明显增加,比如在两个主要学术刊物上原本中国研究者的参与率很低,审查体系比较严格,由于刊登论文的篇数增加,间接表示其研究质量的进步;三是高质量的共同研究计划促进了中国研究的质的发展。但中国学研究者在韩国也面临身份认同的问题,除了为什么研究中国,中国研究对韩国有何现实意义,对全世界有什么意义等问题之外,还有调研经费、学术独立与政策取向的问题等。韩国学者表示,尽管有许多问题,但并不悲观,因为韩国的中国研究人力相对丰富,研究主题、领域与地区都很宽广,只要把握机会,研究者相互鼓励并抱持实践性的态度,韩国中国研究的前途大有希望。

关于日本的中国研究现状。历史上，日本人始终关注中国。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这27年是中日断交时期，但是在日本的论坛里，并没有停止对中国的关心。日本著名中国研究专家马场公彦，通过搜集1945年到1972年这27年间日本发行的24种综合性杂志，共计登载有关中国的论文2554篇；从1973年到1992年日本天皇访华的20年间在日本发行的综合性杂志11种，总计登载有关中国的论文1604篇。系统梳理可以一窥“二战”前后日本人对于中国认识的变化。

在“二战”前的1943年到1945年间，日本论坛通过《外交时报》《东洋经济新报》《文艺春秋》《新潮》《中央公论》《改造》《日本及日本人》《现代》《日本评论》等9部杂志就刊登了与中国相关的报道144篇。中日之间的交流分正式和非正式两种渠道，20世纪50年代为“人民外交”，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为“人民外交”和“民间外交”并存，20世纪60年代以后“半官半民外交”成为主流外交方式。1972年恢复邦交以后转换为“官官外交”，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为“官民并茂外交”，现在发展成为“多渠道外交”和“市民外交”。

马场公彦指出：中日战争的终结使中日间相互认识框架及认识途径发生了巨大改变。人文科学系学理（“中国学 Sinology”和广义的“东洋学 Oriental studies”）受到当时出版界、报道界和学术界的严厉批评，作为理解同时代中国的理论框架的东洋学者的同时代中国论被判断为不合适，因而他们逐渐离开了论坛或学术界，发表同时代中国言论的中国学者也逐步减少。军人、政治家、官僚及“支那事情调查”“支那通”“支那学者”在知识界中不见了踪影。战后，几乎没有马上就开始进行现代中国研究和教育的机构，大学也没有开设相关讲座，导致中国研究出现了空白。

这位日本的中国研究专家因为深有感触而一语中的：被27年间断绝引起的双边认识悬隔出乎意外相当深广。在互相认识上带来了想象贫困以及人文知识的日益枯竭。我们应该直视现实中国可渐渐超过迄今为止的处理水平的存在。中国逐渐化为只靠从来的方法论或先行学术业绩而无法解密的又巨大又复杂的客体，只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60多年间积累下来的经验上的知识或以专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适用的目的而讲究来的结构公式，已经成为怎么也找不到解答的情形。

“现在日中双方需要专心从事的有用的知识课题就是努力探索日本摆脱了长期锁国，中国放宽了长期海禁，开始互相直接交流的19世纪后半期以后，

前辈人士所保留下来的古典作品,将这些作品看作向两国人民为了思考双边关系加深互相理解值得吸取的文化公共资产加以重新评价。”通过此种书目,发现日本与中国怎样遇见,怎样互相理解,有时候在哪里看错,在哪里错开理解等疑问,必须通过对基层的生活感觉或民族感情充分挖掘,才能全面检查相互的认识。

1941年,日本进入战时体制之后,亚洲研究在日本可谓实质性消灭了,但亚洲学却随着战争的进行而膨大。日本民族自此完全将自身的发展投射到“亚洲”之上,“日本帝国”的范围与命运甚至等同于亚洲(东亚)。结果是,战前亚洲研究或者说中国研究的理解结束了对古代与古典的研究,汉学不被重视;同时,亚洲研究或中国研究被地理概念化而且空间化,并不与其对话。作为学科,战前的亚洲学本来对内是因应汉学意即日本原初意义的中国学的缺少部分而生,对外则是为了与欧洲对话而找到自身位置,但自此亚洲学作为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过于膨大,“亚洲”的范围与实质全然与“日本帝国”等同,反而排除了日本人客观思考“中国”的可能性。

随着中国崛起,日本与亚洲的关系更为微妙,双方一方面强调“亚洲内部对话”,但在地缘政治上又隐然有海洋亚洲与陆地亚洲之分别。以当前“亚投行”与“一带一路”为例,日本亚洲学的研究者认为,这是中国在逐渐争夺亚洲发言权的展现。

如今,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韩国,甚至东南亚,渐渐对于“亚洲学”加以关注,由于缺乏对于对方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入了解,在更多的知识体系碰撞的时候,呈现出来的身份和论述策略都将不同。例如,中韩学术界一直强调在学术研究领域里进行合作,但合作成果却不尽如人意。当出现“高句丽历史之争”以及“端午节归属之争”时,两国学术界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沟通与疏导作用,要么“失语”,要么误导,有的专家甚至放不下对对方的偏见,在双方民众互相指责的过程中煽风点火。韩国学者吴秀景指出,既缺乏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又缺乏对中国现实情况的分析,毫无计划但反复地开展中韩文化交流,令人非常遗憾。虽然两国学者每年都会召开无数的研讨会,但当中韩两国在政治、经贸和文化领域里出现摩擦时,学术界却往往提不出合理的问题解决方案,没能担当起中间人的角色。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韩两国关于对方国家的相关研究在数量上飞速增长,但研究主题、研究方法仍然不够全面,研究深度也有待加大。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加深相互理解，除了科学系统的学理以外，还需要尊重文化资产，研究人文科学系统的学理，依靠人文精神进行认识活动。

综上所述，无论是俄罗斯汉学的危机，韩国中国研究的乐观，还是美国、日本中国研究的不尽如人意，无不体现了转型期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研究的急切、向往、热心、焦虑、困境而又困惑。世界各地的传统汉学面临转型，对于中国的研究只有立足传统，聚焦当代，才能有所突破。

在这一背景之下，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于2015年8月在中国成功举办。115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第一次走进亚洲在中国举办，对于中国的历史科学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首位历史学奖获奖学者塞尔日·格鲁津斯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其对世界历史进入“中国时间”的理解。他认为，今天的历史是全球化的历史，关键并不在于如何定义全球化，而是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理解对方，如果从不同的视角了解历史、了解过去就能更好地理解现在。这对欧洲、对中国都一样重要，因为所有人都是全球化的参与者，身处同样的历史语境当中，要用多元的视角去理解历史。

在近些年的研究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提出质疑。然而，多数学者的看法，在倡言“中国中心”的同时，并非要抛弃西方的经验，而是要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双向比较与对视，既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但又不拒绝西方的经验；既重视从西方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一般规律的指导作用，但又不将之神秘化或神圣化，更加重视中国自身经验的独特价值和特殊性，即据之于中国的“实情”。

当今世界充斥着新的变化，比“误解”更严重、更危险的是，西方人习惯用自己的视角去解读中国。当今世界，中国的“存在感”已无处不在，西方无可避免地需要努力理解中国，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中国更应主动讲述自己的历史，用历史事实讲述中国故事。

三

中国独特的历史道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中国历史发生的实际过程对构建中国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基于对这些基本史实的确切了解，才可能形成对中国发展进程的“中国式思维”，才能读懂中国，进而为深化中国问题研究打开思考的大门。这就要求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们既要立足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入了解，又要聚焦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刻分析。

历史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其研究也应丰富多彩。改换视角,突出不同线索的研究,固然会对某些偏颇的绝对的结论有所商榷和匡正,但在更多问题上或者说根本结论上,这些研究仍然是殊途同归。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一直强调关于中国历史社会环境研究的必要性。他指出,“我们的认识尚未赶上本世纪(20世纪)初的进步青年学生。到目前为止,在他们刊载于《江苏》《浙江潮》等杂志上的详细的社会调查大纲中,仍有很多我们至今作不出答案的项目”。^① 社会环境即是国情。毛泽东十分强调国情研究的重要性,但他说:“国情就是社会的性质”,反而导致许多学者对社会环境(国情)理解的简单化,好像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概念就能够解释全部的社会、历史现象。实际上,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已经初步看出了中国社会环境的复杂性,认为应该挖掉三层“陈土”(军阀、官僚、政客)。这样的认识虽然仍觉肤浅,可是却具有明显的先见性。1982年以来,章开沅先生一直强调社会历史土壤的研究,就是由于从孙中山那里受到启发。除研究社会经济结构及阶级结构外,还特别重视更加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

纵观以往海内外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其重心均偏向于人物和事件,而且又都若隐若现地仅以政治斗争和道德评价为准绳,特别是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研究比较薄弱,因而不仅很难全面认识具体人物或事件在历史上的所有作用,而且也难以提高读者对中国社会环境的了解和对社会发展的把握,因为人物和事件都是社会运动的产物,而运动又总是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的。

而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不能满足于只是调换一下视角再现历史进程,而需力图发现若干意义深远的现象并加以分析,寻求某些层次和范围内的规律性。对已有研究中的一些观点,也可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通过讨论来深化各自的认识。既有研究虽然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传统史学中历来具有中心地位的“政事”,包括国内革命战争和对外反侵略战争,作为关注重点,但经济发展和实业建设问题、教育和文化事业的转变问题、社会结构的变化问题、历届政府的改革乃至改良问题,一直被纳入其研究体系加以考察。而人的素质的提高,则在研究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诚如章开沅先生所描绘的:历史一再地证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他

^① 章开沅:《关于孙中山研究的思考》,《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4期。